

论特德·休斯中后期诗歌的社会生态观

陈 红

内容摘要：特德·休斯早期和中期的诗歌突出表现了自然与人之间的对立和隔离，中后期诗歌则深入探究了自然与社会之间复杂且深厚的联系，表达了一种较前期更为成熟的自然观或如著名休斯研究者特里·吉福德所称的“社会生态观”。本文以休斯中后期的三部代表诗集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诗人的社会生态观在其中的具体表现，如《埃尔默废墟》再现了荒原上的文明印迹，《望狼》书写了人与动物共同承受的悲戚命运，《河流》传达了诗人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现实关切。文章还特别关注作为休斯社会生态观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意识，在加强其生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方面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特德·休斯；社会生态；地方意识；责任感

作者简介：陈红，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英国诗歌与生态批评研究。

Title: On Ted Hughes's Social Ecology in His Mid-late Poetry

Abstract: While Ted Hughes's early and middle poetry shows animals and humans as opposing or cut out from each other, his mid-late poetry explores the deep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society, expressing a view of nature that is much more profound than his earlier view and defined by Terry Gifford as "social ecological." The present paper is to analyze Hughes's social ecology in three of his best works published between the late 1970s and the late 1980s, namely *Remains of Elmet*, *Wolfwatching*, and *River*. It also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indispensable role played by Hughes's place consciousnes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social ecology in strengthening the poet's eco-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Ted Hughes; social ecology; place consciousness; responsibility

Author: **Chen Hong** is professor at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British poetry and ecocriticism. Email: lilychen9138@hotmail.com

特德·休斯的诗歌创作因其题材的转变一般分为早期、中期、中后期和晚期四个阶段。倘若集中考察其自然观的发展，则可以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为界，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休斯的早期和中期诗歌突出表现了自然与人之间的对立和隔离，其中后期诗歌，如创作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这一时期的《埃尔默废墟》、《河流》和《望狼》，则深入探究了自然与社会之间复杂且深厚的联系，表达了一种较前期更为成熟的自然观，著名诗评家和生态批评学者特里·吉福德将其称之为“社会生态观”。具体而言，休斯中后期作品的一个

显著特点是表现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以不同的方式或形式共享命运,比如《埃尔默废墟》里自然面貌因工业文明而改变,并承载着它的遗迹,共同走过历史的长河;《望狼》中的人类与动物一样饱受苦难;《河流》中的人、鱼、以及熊等动物同属一个生态系统,一同感受着河流传递出的生命律动。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构成了所谓“社会生态”存在和运行的基础。“社会生态”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学者默里·布克钦提出,其理论基础在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深层联系”(Bookchin 59)^①。布克钦还认识到,无论是自然的构造还是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都受限于某个具体的地方,都会以该地独有的方式进行。换言之,一个人的社会生态观的形成有赖于其对地方的深入了解。在我看来,休斯的地方意识是其社会生态观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促使他更加深刻地体会环境与人之间相互影响、互惠共生的关系,也更多地激发出他的生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本文旨在对休斯的社会生态观展开分析,亦会特别关注诗人为这些诗歌所设的地方场景,从而窥见地方场景及其迁移或延伸对诗人社会生态观的影响。

一、《埃尔默废墟》:荒原上的文明印迹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休斯开始把目光由神话转向现实,有不少现实主义风格的诗集相继面世,如《埃尔默废墟》、《望狼》及《河流》这几部重要作品^③。《埃尔默废墟》出版于1979年,诗人的社会生态观第一次在这部诗集中得到了现实主义的表达^④。在休斯的主要作品中,唯有这部诗集完全以一个特定的地区为题材,即休斯早年生活过的凯尔德河谷一带一个叫埃尔默的地区。诗人专注于那里的人物、景物及其历史,表现出极强的地方依附感乃至地方意识。为了更好地表现那个地区的独特气质,休斯还邀请了摄影师费·高德温与其合作。高德温那些极具沉思气质的黑白照片很好地把握埃尔默地区特有的气候、景物、光线、以及工农业生产给当地带来的种种变化,与休斯的诗歌相得益彰。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休斯在《埃尔默》一书中专门提供了一份有关这个地区的长达三页的注解^⑤。据他介绍,埃尔默是西约克郡的一部分,曾是英格兰最后一个独立的凯尔特王国,一度横跨整个约克河谷,后来因历史原因退缩到凯尔德上游的峡谷地带。从地理位置看,埃尔默的南面和北面均被高地荒原所切断,使得整个山谷宛如一座孤岛,但同时因为北海和爱尔兰海的潮汐都在此地达到高点,又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高速通道(Elmet 9)。可以说,这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这个地区既封闭呆滞又独立自由的氛围,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正是由于对于埃尔默地区有着如此深入的了解,诗人才能够理解并接受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并视之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埃尔默废墟》里的许多诗歌都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进程对自然的必然影响。诗歌“长长的隧道顶部”写到诗人过去常去钓鱼的运河上的一座桥,满载羊毛和棉花的大货车在桥上川流不息;然而就在滚滚车流之中,“一个野神的种子在为我开放/这么一朵深色虎斑百合/在车轮间,在备受折磨的轮轴下呼吸着”(Three Books 40)^⑥。让诗人意想不到的是貌似娇弱的百合花竟能在车轮辗转间幸存下来。类似的情境也出现在“锡安山”一诗中。当地人数百年来信仰循道教,宗教的禁锢让他们的思想难见天日,就像诗人家中厨房的窗户永远被锡安山的墓碑石遮住了阳光;惟有蟋蟀们是勇敢和自由的。诗的最后写到:“在我躺在床上,被长久地窒息之后/我仍能听到他们/用充满愤怒的凿子和起子/撬动着宗教的石方”(Three Books 47)。诗人感叹于自然界小生命的顽强坚持,而事实上自然在工业文明或宗教压迫下的任何对抗都是无奈和无力的。在休斯的眼里,埃尔默的自然环境是历

史的一部分，它和那里生活的人们一样注定被工业革命影响着、改变着。“山石是满足的”这首诗更是明确地把自然与人在不可抗拒的工业化进程中所遭受的摧残联系起来。在封闭的空间里，在织机的鼓动声中，石头“忘记了它的野生根源 / [忘记了] 它的大地之歌。”与此同时，磨坊里的人“呆在各自的位置，固定着，像石头 / 在织机的歌声中颤抖” (*Three Books* 9)。可见，自然和人都沦为了工具，沦为了机器的奴隶。科思·萨格认为《埃尔默废墟》展现并控诉了人类文明对自然犯下的罪行；但让人类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他们企图征服自然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被磨坊、教堂和战壕奴化和征服” (*Sagar, Laughter* 153)。

在休斯的早期和中期诗歌里，人与自然基本处于一种对立状态；而在有关埃尔默的诗歌里，人和自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有着戚戚相关的命运，同时人类文明的痕迹也深深地印刻在自然当中，成为自然的又一面貌。“谢科尔顿山”一诗的开头便是典型的例子：“死去的农场，死去的树叶 / 紧紧抓住长长的 / 世界的枝干” (*Three Books* 41)。农场虽已不复存在，但痕迹尚在，拒绝着被遗忘的命运。“当人们来到山顶”一诗同样描写了一幅破败之景。诗人把房屋和街道做了拟人比喻，它们就像得了风湿和腰椎疾病的人，难以支撑起自身，更难以担负延续人类文明的重任。在与此诗相配的黑白照片中，一栋不大的房子立在山顶，屋子顶部和侧面的墙壁已多处破损，底楼看似金属质地的门窗紧闭，楼上的窗玻璃几无完好。然而就在这栋貌似已被遗弃的房屋里，“在某些令人晕眩的时刻 / 一台电视机 / 在狼的瞭望处闪烁着” (*Three Books* 29)。可以想象，在遥远的过去，电视机所在之处或许正是荒原狼的安身之所。萨格认为这一句表现的是“自然被技术所取代”的事实 (*Sagar, Hughes and Nature* 236)，但我不认为诗歌上文可以支撑起这个结论。在我看来，诗歌最后这一句所隐含的恰恰是文明与自然相伴而生、难以隔离的关系，就像吉福德所说的，“在这片风景中，人类失败的努力可以被理解成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Gifford, Ted Hughes* 49)。

休斯也曾表达过他对荒原上的人造建筑所怀有的复杂情感：“我觉得这些建筑物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纪念碑，这种感觉伴随着我长大” (*Letters* 379)。在休斯为埃尔默所做的注解中，他讲到该地区最早的繁荣得益于它的羊毛工业，而工业革命的到来很快便使原来的家庭工业让位于大规模生产，一个又一个的磨坊在河道上立起。到了 19 世纪末，凯尔德河已然成为“英国被开发得最为严重的河流”，这其中循道教牧师威廉·格里姆肖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Elmet* 10)。他不仅大肆开山挖石修建教堂，还用石头垒成又大又高的、监狱般的磨坊。不过这一切到了 20 世纪三十年代便随着工业和宗教在当地的衰退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磨坊相继关闭，教堂被清空，河道边的农场也慢慢荒废，留下的只是一处处废墟。休斯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荒凉背后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还隐藏在很多诗里，比如“沙克尔顿山”、“阿尔科姆敦的墙”以及“哈普滕斯托尔老教堂”等等。在 1979 年版的《埃尔默废墟》和 1994 年版的《埃尔默》的一些照片中，我们看到了废弃的农场和半裸的稀疏的草场，也看到了教堂的残垣断壁，我们不得不为眼前的荒凉所震撼，并感慨于人类的虚妄努力给自然景观带来的改变。正如爱德华·哈德利所说，虽然这些人类文明的遗迹“见证了野心和成功所具有的持久影响，但它们更多地却是纪念了一个被遗忘的、注定失败的事业” (*Hadley* 57)。

显然哈德利在提醒人们，人类文明对于自然的影响是深重且不可逆转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尽量减小对自然的人为干预或伤害。这样的观点应该可以被休斯接受，但休斯与哈德利的立场有所不同，因为他所面对的是故乡，所写的是他与父老乡亲

听闻过并一同见证过的历史变迁,因此他的诗歌也在扼腕叹息或愤怒声讨的同时,表现出更多的理解。或许正是诗人的地方意识赋予他责任感,使他选择以诗歌、图像和注解相结合的方式,记录并纪念这个被称作埃尔默的地区因工业革命而兴衰的过去和今天。诗人显然认为,尊重埃尔默的历史即意味着接受前人对这一地区的所有改变,也包括接受荒原上的工业化遗迹,将其视为荒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休斯在此表现出的自然观因为增添了人类的因素而更具包容性,也更符合社会历史现实,很好地应证了吉福德在评价布克钦的“社会生态”理论时所说的,“把人类排斥在自然观之外其实是在减弱‘自然’这一术语的作用”(Gifford, “Hughes’s Social Ecology” 82)。

二、《望狼》:人与动物的命运与共

《望狼》出版于1989年,是休斯最后一部无主题诗集。与《埃尔默废墟》一样,《望狼》中的大部分诗歌也以埃尔默地区为题材,写那里的景物、人物,及其历史。不过与前一部诗集刻意表现非个人化情绪有所不同,这一部诗集有多首诗写到休斯的家庭成员,具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望狼》的题材固然纷杂,但其实重点只有两类:家庭诗和动物诗。家庭诗自然都以埃尔默为背景,动物诗也大多涉及某个具体的地点,如伦敦动物园、唐卡斯特赛马场和赞比亚南卢安瓜国家公园等,这些真实的地方场景使得诗人对人与动物命运的关注,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望狼》在其貌似零散的家庭诗和动物诗下面,暗藏着拯救动物与拯救个人灵魂乃至拯救人类之间的联系。我们在此看到,动物和人一样受到关注,动物的精神和人类的精神一样得到赞扬,野生动物种类的消失和家族幽灵的隐匿获得同样的哀叹,现在和过去也在不断的交叉换位中被赋予同等重要的意义。

休斯最早以动物诗扬名,其早期和中期诗歌中的动物都是强悍有力的,足以与人类抗衡;它们更多是作为一种自然力量或精神的象征,少有现实意义。休斯在其中后期诗歌如《摩尔镇日记》里开始记录农场动物的生死磨难,在《河流》的个别诗歌中隐约提及盗猎现象,但涉及现实的笔触中透露出的只是一种爱莫能助的同情。与以往不同,《望狼》中的动物诗表达出明确的动物保护意识,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诗歌“曼彻斯特天际火车”和标题诗“望狼”涉及被囚禁动物的生存状况,“黑犀牛”一诗更是通过声讨滥杀黑犀牛的罪行,对野生动物的灭绝所可能导致的生态危机进行“文化干预”^⑦。在《望狼》一书的最后一页,诗人加注说明写这首诗是为了给拯救黑犀牛的筹款运动筹集资金。他在其中提到,英国作家马丁·布思为报道黑犀牛所处困境,曾于1986年和1987年两次前往赞比亚南卢安瓜国家森林公园拍摄影片,结果第二次去就发现那里原有的一个大犀牛群已难觅踪影。这个事件被诗人处理后放进了“黑犀牛”一诗中:一头黑犀牛被摄像机捕捉到,摄影师观察着镜头中犀牛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哪怕是耳朵和尾巴的细微颤动,当然还有他的角——那是他和他的同类被捕杀的主要原因。然而摄影师不能长久地注视,仿佛有个声音在催促着他:

快点,快,不然在你注视的时候
他就会消失
在微光中,化为一堆令人作呕的恶臭。

骨头会出现在胶片上。(Wolfwatching 27)

上引最后两行是诗人对于犀牛陈尸非洲草原的想象，诗人的这种紧迫感实际上正是所有投身环保运动的人士所共有的。吉福德认为《望狼》里有个贯穿始终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投身到‘环境战争’^⑧中，去拯救我们自己，我们的文化以及其他的生灵，那么我们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经受的家庭中漫长的个人痛苦又有何意义？”（Gifford, *Ted Hughes* 63）在吉福德看来，休斯早已把人类生活和文化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把其对社会和对自然应负的责任视为一体。应该说他对休斯的理解是深刻的。

为了更好地表现人与动物息息相关的命运，休斯还利用《望狼》一书的诗歌排列大做文章。但在进入相关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环境正义”这个概念。作为生态批评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它最早出现在2002年出版的《环境正义读本：政治、诗学和教学》一书中，琼妮·亚当森等人给它下的定义是：“所有人都应有的权利，去平等分享一个健康的环境所带来的益处”（Adamson et al. 4）。这一概念的核心是：环境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比如自然“资源”被剥削和滥用的现象就常常伴随着人权遭受践踏的残酷现实。不难看出这个概念与社会生态观在理论基础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我们可以视之为后者的一个具体化发展。吉福德认为休斯在《望狼》中对诗歌进行了特别排序，表露出诗人对环境正义的关注。他列举了三个组合，每个组合均由三首诗歌组成，一前一后两首为动物诗，中间夹着一首动物诗。动物诗抗议人类强加于动物的种种不公，比如囚禁、偷猎、商业比赛等合法或非法的行径；人物诗哀悼战争中失去的生命，也表现家人和乡亲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遭受的心灵伤痛。以标题诗“望狼”所在的组合为例。诗歌“望狼”写到伦敦动物园里的一头老狼和一头小狼，他们整日被参观者的目光注视着，百无聊赖。诗人想象着老狼心中的不甘和无奈：“[他]退缩到/狼皮的震颤中，他已/不知如何才能不辜负这身狼皮”（*Wolfwatching* 13）。与此同时，小狼那“坚毅的遗产”也正一日日地被蚕食着，只得靠昏睡来燃尽“新的无望”（*Wolfwatching* 14）。如同这些被囚禁的狼，诗歌“如尘土的我们”中的父亲虽然从战场上死里逃生，却难以走出战争的阴影，其内心空虚无比，整日在沉默中呆坐，“被杀死却还活着”（*Wolfwatching* 11）正所谓虽生犹死。在另一首诗“电话线”中，竖立在荒原上的电话线中传来“将人骨倾倒一空的声调”（*Wolfwatching* 16），暗示战争给埃尔默地区带来的人口损失，而作为动词的“empty”一词也暗含着情感空虚、无所寄托之意。以上三首诗中的人和动物或受害于严重失衡的物种关系，或成为国家利益之争的牺牲品，其所受的伤害是社会不公的必然结果。事实上，环境正义的缺失正来源于如此这般对于弱势生命的漠视。在吉福德看来，《望狼》一书“把诗人对于人类的关注以及对于高于人类的自然的关注进行交叉和并置”，因而“体现了休斯的社会生态观”（Gifford, “Hughes’s Social Ecology” 83）。

吉福德注意到《望狼》一书所蕴含的环境正义思想，其观察无疑是敏锐的，但我认为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补充两点。首先，休斯对动物权利的主张显然已超出动物福利的范围而上升到精神的层面。唐卡斯特的赛马以及伦敦动物园的狼或许没有温饱之愁，也不像赞比亚国家森林公园的黑犀牛那样有性命之忧，但它们所遭受的精神摧残是巨大的。在诗人的笔下，囚禁生活给动物们带来的精神压抑与战争给父老乡亲造成的心灵创伤一样让人动容；动物与人之间因此在伦理的层面上具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其次，从地方性的角度而言，《望狼》一书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埃尔默废墟》对埃尔默地区的固守。“黑犀牛”一诗甚至将关注的目光延及非洲，“在居留地上”也脱离国界，从英国北部矿区遥望北美印第安人居留地。这种地域上的突破看似与我们前面所说的地方意识或地方依附感相矛盾，实则

是社会公平正义思想和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意识之必需。米克·司密斯针对狭隘的生物区域主义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或许对我们有所启发^⑨。他认为一旦我们过分局限于生物区域所划定的地理边界,就会相应地“给我们的道德责任感划上界线”(Smith 214)。为此,他接受德博拉·塔尔的建议,提出:既然我们的“共有社区分布如此广泛”,那么“地方意识在今天或许需要我们不断地发挥想象力”,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的道德关怀越行越远(qtd. in Smith 214)。与C.斯皮瓦克提醒《想象的地图》一书的美国读者一样,休斯也希望借诗歌在“居留地上”让他的读者“认识到[美国政府]对印第安部落的所作所为[,认识到]到处都发生着同样的故事”^⑩。同样,他也在以“黑犀牛”等动物诗告诉我们:动物们的生存困境乃至绝境,是一个广泛存在的全球性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望狼》中看到,休斯一方面几乎总是在某个具体的地理和文化空间里去感受动物或人的处境,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扩展其关注的地方规模。他表现出的正是劳伦斯·布伊尔所称道的“全球性地方意识”(Buell 92)。

三、《河流》:生态意识与社会责任

《河流》最早的单本发行于1983年,是继《埃尔默废墟》之后又一部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的诗集,也是休斯在八十年代出产的唯一一部主题诗集。其实本文讨论的三部诗集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命运,《埃尔默废墟》和《望狼》主要采用历史回顾与现实观察相结合的方式,《河流》中的诗人则通过身体的直接参与,体验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快乐,感受自然与其内心的神秘联系。诗人以河流为媒介,重新认识自我,这种个人的内心感悟是《河流》区别于其它两部诗集之处。事实上,河流在让诗人沉思的同时,也促使他更多地关注日益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在我看来,这种对于自然以及社会的强烈责任感正是休斯的社会生态观的核心,它隐含在《埃尔默废墟》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中,体现在《望狼》对个体动物命运的真切关怀乃至“文化干预”中,更表现为诗人在《河流》内外为保护河流呼号呐喊,并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实际的环保行动当中。

休斯对水污染的认识由来已久。他早年生活的西约克郡的凯尔德河就是条没有鱼的死河,而他后来搬去的南约克郡的唐河也是从谢菲尔德到唐卡斯特一带工业区的排泄口。休斯在《三本书》的注释中专门讲到了这些河的命运^⑪,还特别提到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亲眼目睹他垂钓的一个湖泊里的鱼全部死于农业生产造成的水污染。诗歌“1984,走在‘塔卡之路’上”里的“塔卡之路”是北德文郡的一条沿河旅游线路,因亨利·威廉姆森的故事书《水獭塔卡》而闻名。休斯幼年时曾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然而到了1984年,大量未经处理的化学制品从农田进入河流。休斯在诗中用“整桌宴席”来比喻那些大量的、种类繁多的化学制品,而用“下水道”来比喻被当作藏污纳垢之所的河流,其间隐含的强烈的讽刺意味自不待言。这样的河流就像一个“病人”,那些驻足河边的参观者,就好比站在“一张病床”前。最糟糕的是,对于河流这个病人而言,这是一所它无法离开的“医院”,因为危害无处不在,让它无从防范(Three Books 118-19)。诗人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隐藏在环境污染背后的政治与商业集团利益,以及个人利益。在生态环境的整体利益与人类的物质需求发生冲突的情形下,人类占据了诉求的先机,沉默的河流自然成了被动的一方。休斯在诗歌的结尾告诉我们,施害于他人者必先遭罪,人类在毒害河流的同时也是在为他自己准备“死亡-破布”(Three Books 121)。休斯对于水污染的深切担忧在短诗“如果”中有着更加简单直接的表达。他明确指出,一旦空气和土壤受到污染,河流必定遭殃。它不得不

吸收来自大气和土地的所有毒素，然后流入海里，然后海水又回到大地，如此周而复始地恶性循环。诗歌最后是对造成这一切恶果的人类的质问：

如今你在哪里能找到纯净的水？

雨滴已经回到了杯中

你已经成为了自己的臭水沟，在那里饮水。(Three Books 137)

上引最后两行的英文原文均以“已经”(Already)开头，强调的是事态的不可逆转性。以上两首诗中，诗人痛斥了人类戕害自然，并将最终自食其果的愚蠢行径。这种行径在《埃默默废墟》呈现给我们的回忆中已然出现，可见至少从工业化伊始至今的数百年间，人类从未停止过对自然及对自身的伤害。

休斯对于水污染问题乃至整个环境问题的重视与他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西方世界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不断出现环保志士的呼声。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麦克斯·尼科尔森的《环境革命》以及彼德·辛格的《动物解放》都是六、七十年代出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环保著作。休斯至少看过前两本书，并为《环境革命》写过书评。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方面对于尼科尔森作为英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前任主席所揭露的现实，以及公众对于事态的一无所知表示震惊，另一方面又深深地感慨于尼科尔森满怀希望的努力。可以说正是这本书的缘故，休斯开始乐观地面对人与自然的未来。他在文章的最后总结道：“假如西方化的文明人（这个进化的错误）愿意纠正错误的话，想必她〔自然〕会改正他。假如他不愿意，她仍然会做出努力。这本书让人们比以往更加坚信，这个时刻已经到来”(Winter Pollen 135)。正是诗人怀有的乐观主义精神，使得他一方面寄希望于自然的神力来拯救其自身以及人类，另一方面又把希望给予了社会，因为他深知，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诗人正是由此愿望出发，持续不断地利用文学的力量对毒害河流的行径进行口诛笔伐，以此唤起公众的危机意识。例如他以桂冠诗人的身份所写的第一首诗，名为庆贺哈里王子的命名礼，实为反映德文郡一带河流的污染状况；他还以一个杰出的儿童故事“女铁人”对水质和公共健康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威胁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此外诗人还积极地投身到一系列旨在拯救河流的实际行动当中，比如他在1983年协助组建了一个名为“托里奇行动组”的民间环保组织，目的在于对德文郡托里奇区一带河流的污水排放系统形成有效的公共干预体制。1985年，休斯代表该组织在听证会上做精彩陈述，而该组织通过对当地排污系统的成功干预行动，最终促成了一个国家级水资源保护组织的成立。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休斯因其对环境正义的关注而具有了多重身份，既是作家，又是教育家，同时还是以环保为核心的社会活动家。他在一次访谈中说道：

大多数人听我讲到水污染问题，都会想出种种理由来为此辩护。他们认为你在保护鱼或昆虫或花。但其实〔水污染〕给水獭等生物造成的影响也意味着它对我们的影响。这不是爱护鸟类和蜜蜂的问题，而是如何让人类平安地步入下一个世纪的问题。(qtd. in Morrison 32-4)

显然，在休斯的社会生态观中，人与自然万物犹如一个大家庭，彼此休戚与共，因此他所

感到的责任必定是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双重责任。莱昂纳多·司奇杰认为《河流》传递出的责任感是它最有价值的部分。他在1991年发出如下预言：“终有一天《河流》会被纳入世界文学杰作的核心部分，成为地球人的必读，以帮助他们获得成年所必需的责任感”(Scigaj 133)。

如果把地方意识和责任感结合起来，我们不难看出，休斯的责任感首先来自于他对自己身处的较小范围内的环境的关心，这是地方意识或地方依附感的一种初级表现形式。正如米切尔·托马肖所说，一个人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所在之地的生态及文化，了解其中的好与不好，并投入全部的感情，才能拥有“基于土地的敏感”，进而发展成对土地的责任感(Thomashow 121)。但这里所说的土地或地方是具有可扩展性的，会随着一个人生活轨迹的延伸甚至想象力的延伸而形成布伊尔所说的“同心圆”效应^①。《河流》一书所涉及的水体以德文郡的河流为主，因为休斯与第二任妻子卡罗尔·休斯的家就在德文郡的北陶顿村，临近陶河和托里奇河；此外还有苏格兰、爱尔兰、冰岛和阿拉斯加的一些他曾去垂钓的河流。从他八十年代初开始创作《河流》，到对之大幅度增删后将其收入1993年版的《三本书》，其间休斯不停地为保护家园的安全奋笔疾书、奔走相告，同时也对自己涉足过的遥远之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表示关切。他在去世前曾解答尼克·甘米奇提出的有关“格尔卡纳河”一诗及相关故事的问题，并在信的最后表达了对格尔卡纳河现状的担忧之情：“格尔卡纳河已经被毁了”(Letters 736)。在休斯看来，过度的旅游开发让这条河乃至整个阿拉斯加丧失了它原有的神秘的野性美。进入九十年代后，他越来越多地将自己作为桂冠诗人的政治影响力延伸到英国境内更大范围的河流保护活动中，担任了“西部河流基金会”的首位受托管理人，而由该基金会发展形成的“河流基金会组织”现已成为英国国家级水质检测组织。休斯还始终不忘把文学创作与环保实践相结合。1990年，他创立了“神圣地球戏剧基金组织”，意在通过戏剧比赛的形式，鼓励各国年轻一代剧作家将环保意识贯穿于他们的作品当中，从而达到将生态思想代代相传的目的。休斯的这些行为无疑显示出他具有超越地界和国界的生态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注解【Notes】

①劳伦斯·布伊尔在其著作《环境批评的未来》中列举了学界关于“社会生态”这一概念的起源所持有的不同看法，比如约翰·克拉克就指出，至少在布克钦之前一百年已有类似观点，另有学者把刘易斯·芒福德称为“美国社会生态学家的第一人”。参见Buell 146。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生态批评学者鲁枢元也提出过“社会生态”的概念，指的是人与人或人与社会的关系，与西方学界的定义相去甚远，实际是对“生态”做泛化理解的结果。

②“地方”(place)最早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后被生物区域主义重视，继而被纳入生态批评的视野。米克·司密斯认为地方是“社会与环境关系以独特方式相结合的特殊产物。”参见Smith 215。吉利恩·罗斯认为众多地方之所以相互不同，是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是由环境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过程所构成的一组特殊的相互关系”。参见Gillian Rose,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41。可见，“地方”的概念包含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各个层面，因此十分适合本文有关社会生态的讨论。学界有关“地方”的研究已有很多，其中不少涉及地方意识(sense of place/place consciousness)和地方依附感(place attachment)这两个与本文有关的概念，但都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在我个人看来，地方依附感主要表现为对

某地（无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想象中的）的主观情感认同，而地方意识则有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即情感与理智的双重性。主观维度上它等同于地方依附感，客观维度上它意味着对某个具体地方的全面且深入的了解，是一种理性的认知。此外，无论地方意识还是地方依附感都拒绝把“地方”视为固定不变的地理空间，这一点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展开。

③休斯出版于同一时期的主要作品（不包括儿童文学作品）实际有四部，除了文中提到的三部外，还有出版于1979年的《摩尔镇日记》，只不过就社会生态观而言，这部作品表现得不够典型，因此不做讨论。

④吉福德观察到，休斯最早表达其社会生态观是在发表于1978年的《洞穴鸟》中的一首诗“新郎新娘躺着三天不见人”当中。在吉福德看来，诗中男人与女人的婚姻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结合”。参见Gifford, “Hughes’s Social Ecology” 82。而这一象征性主题在《埃尔默废墟》之后的一些作品中才得到了进一步的、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挖掘。

⑤1993年，休斯将部分《埃尔默废墟》里的诗歌，连同《洞穴鸟》和《河流》里的一些诗歌，收录到《三本书》这个集子里。而到了1994年，他又出了一本名为《埃尔默》的诗集，以《三本书》里收录的《埃尔默废墟》诗歌为主体，另外增加了14首与凯尔德河谷有关的诗歌。

⑥本文所有休斯作品的引文均为笔者自译。凡引用时随文注出作品缩略名及出处页码，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⑦参见德里克·沃尔科特对《望狼》一书的评价，转引自Gifford, *Ted Hughes* 106。

⑧“环境战争”一词是休斯自己的表达，参见Terry Gifford, *Green Voices: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Nature Poet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95) 130。

⑨按照劳伦斯·布伊尔的定义，“生物区域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西部的一种哲学或观点，认为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人应尽可能顺应此地的生态限制。”参见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48。布伊尔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生物区域主义观点的利弊。司密斯所针对的也并非这个观点本身，而是个别学者如柯克帕特里克·塞尔对于“地方”的狭隘理解。

⑩句中引文见于斯皮瓦克为其翻译的孟加拉国作家马哈斯韦塔·戴韦的故事集《想象的地图》所作的序。参见Mahasweta Devi, *Imaginary Maps*,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xi。

⑪《河流》最早作为单行本发行于1983年，1993年版的《三本书》将其收入时在首版的基础上删去了9首诗，增加了13首诗，包括“1984，走在‘塔卡之路’上”。本文所讨论的《河流》中的诗歌均出自《三本书》版。

⑫布伊尔用“同心圆”的比喻说明传统上一个人与某地的情感联系是“从其大部分生活所依靠的家园基地或家园范围发散开去，强度逐渐缩小。”但这一传统模式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似乎已不复存在，因为在今天，很多人远离家园工作或者有了第二家园，使得“地方依附的扩展看起来更像一个群岛而不是同心圆”。参见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0。我在文中无意就同心圆或群岛的比喻进行辨析，只是利用前者说明地方依附感或地方意识具有可扩展性。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damson, Joni, Mei Mei Evans, and Rachael Stein, eds.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 Politics, Poetics & Pedagogy*. Tucson: The U of Arizona P, 2002.

Bookchin, Murray.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Ecology: Essays on Dialectical Naturalism*. 2nd ed. Montreal: BlackRose Books, 1995.

Buell, Lawrence.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2005.

Gifford, Terry. "Hughes's Social Ecolog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ed Hughes*. Ed. Terry Gifford.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1. 81-93.

---. *Ted Hugh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Hadley, Edward. *The Elegies of Ted Hughe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Hughes, Ted. *Collected Poems*. Ed. Paul Keega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3.

---. *Elmet*.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94.

---. *Letters of Ted Hughes*. Ed. Christopher Rei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7.

---. *Three Book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3.

---. *Winter Pollen: Occasional Prose*. Ed. William Scammell. New York: Picador, 1994.

---. *Wolfwatching*.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9.

Morrison, Blake. "Man of Mettle." *Independent on Sunday* 5 Sept. 1993.

Sagar, Keith. *Laughter of Foxes: A Study of Ted Hughes*. Liverpool: Liverpool UP, 2000.

---. *Ted Hughes and Nature: "Terror and Exultation"*. Peterborough: Fastprinting Publishing, 2009.

Scigaj, Leonard M. *The Poetry of Ted Hughes: Form and Imagination*. Iowa City: U of Iowa P, 1986.

Smith, Mick. *An Ethics of Place: Radical Ecology, Postmodernity, and Social Theory*. Albany: State U of New York P, 2001.

Thomashow, Mitchell. "Towards A Cosmopolitan Bioregionalism." *Bioregionalism*. Ed. Michael Vincent McGinnis. London: Routledge, 1999. 121-32.

责任编辑：桑 晔